

《金瓶梅》作者“汪道昆说”质疑

程石磊¹

(安徽大学 徽学研究中心, 合肥 230039)

【摘要】：20世纪90年代以来，潘志义等人提出《金瓶梅》作者为徽州人汪道昆的观点。但这些持《金瓶梅》作者汪道昆说的学者们，在相关的论证过程中却多有失误——历史上徽州并未改称“兰陵”，汪道昆并未参与编纂《水浒传》，《金瓶梅》中的徽州方言与习俗的论据也不充分。在尚无新材料发现之前，目前的研究很难证明《金瓶梅》诞生自徽州，更不能证明《金瓶梅》的作者就是徽州人汪道昆。文章认为，学者在进行相关研究的时候，应避免先入为主，避免被地方主义情绪所影响。

【关键词】：《金瓶梅》 汪道昆 徽州 方言 习俗

【中图分类号】：I206 **【文献标志码】**：A **【文章编号】**：1008-3634(2018)04-0052-06

一、引言

关于《金瓶梅》作者的问题，学界历来争论不休。大体说来，明人笔记中的记载猜测的成分较多，而没有统一的说法。而有清一代，人们则大体认为《金瓶梅》出自“后七子”之一的王世贞之手，并附会有“苦孝说”、“清明上河图流传”等许多传说。直到20世纪30年代，吴晗、郑振铎、鲁迅等人撰文质疑“王世贞说”，学者们开始重新审视王世贞与《金瓶梅》之间的关系。自此之后，除有人仍坚持“王世贞说”之外，又有各种各样的假说陆续提出，让人目不暇接。在尚无与《金瓶梅》直接相关的新材料发现之时，关于《金瓶梅》作者的诸多假说，多出自猜测与附会，强有力的证据并不多。

上世纪90年代以来，以潘志义(笔名苟洞)、王潮涌、丰吉、韩文杰、华柯等为代表的学者们，提出了《金瓶梅》作者是明代徽州著名学者汪道昆的观点，并在地方刊物上发表一系列的研究论文，使得“汪道昆说”渐成体系，近年来更是获得了学界的重视。其中潘志义更是从徽州方言、徽州商人、徽州地理、徽州民俗、徽菜、徽州建置等许多方面论证《金瓶梅》的诞生地即是徽州，而是书作者即是明代徽州学者汪道昆。但是，通过对《金瓶梅》原书以及其他相关资料的梳理，从几个角度考察“汪道昆说”持有者所提供的论据，笔者认为“汪道昆说”是不能成立的。

二、徽州在历史上未曾改称“兰陵”

《金瓶梅》自成书之日起，人们对它的作者就有着不同的猜想，但多数猜想并无真凭实据，只有“词话本”所载欣欣子序中明确有“兰陵笑笑生”的提法，直接指出《金瓶梅》的作者是一位化名为“兰陵笑笑生”的人，之后这种说法大体为学界所接受。“笑笑生”为作者化名，因而关于作者身份的讨论多集中在了地名“兰陵”的选择上。

关于兰陵，古时有兰陵与南兰陵之别，关于《金瓶梅》的作者亦有南北之分。以对兰陵南北选择的不同，使得学者们对《金瓶梅》作者的猜测多集中在山东、苏南这两个中心上。可是在兰陵与南兰陵之外，持《金瓶梅》作者“汪道昆说”的潘志义却提出了“兰陵”就是指徽州的第三种说法，并为一部分人所认可。潘志义通过《新安名族志》一书中关于徽州萧江氏的记载，认为“其

作者简介：程石磊(1993-)，男，黑龙江鸡西人，硕士生。

实,在中国称‘兰陵’的还有一个地方,这就是徽州。徽州在五代时曾称‘兰陵郡’。只是这个‘兰陵’郡号存世时间太短,没有载入史册,又时隔久远,被人遗忘了。”^[1]从而认定徽州在唐末五代时期曾经更名“兰陵”郡,并以此为其《金瓶梅》作者“汪道昆说”的重要依据。

关于徽州的历史沿革,方志载之甚详,但并不见有唐末曾更名“兰陵”的记载,为何罗愿、汪舜民、方信、汪尚宁、赵吉士等人不载,而汪道昆却独知此事,本身就很值得怀疑。笔者通过对于相关文献的重新考察认定:关于徽州历史上曾改称“兰陵”的论断,实际上是潘志义先生对文献误读的结果。

为了方便叙述,我们将潘志义所引《新安名族志》中江氏小序摘录如下:

江出嬴姓,伯益之裔。玄仲受封于江,因以为氏,郡号济阳。又有萧江氏,本萧姓,唐宰相遘之仲子曰祜,为护军兵马使,广明间伐巢有功,封柱国上将军,镇守江南,驻兵于歙黄墩,谋复唐业不克,遂指江为誓,易姓江焉,郡号兰陵^[2]。

上述文字记载了徽州江氏的两大族派,即徽州江氏根据来源的不同区分为济阳江氏和萧江氏。与潘志义先生所谓将歙州(徽州前身)“更名兰陵”相关的是其中的萧江氏一族。萧江氏来源于中古望族兰陵萧氏,南朝时期为齐、梁两朝皇族,入唐则累世显宦,有“八叶宰相”之誉。按现存萧江氏谱牒记载,萧江氏的迁徽始祖萧祜即为唐僖宗宰相萧遘次子,因黄巢起义与政治失势而避难歙州,其后子孙散居,渐成徽州名族。

因为萧江氏与兰陵萧氏之间的渊源,萧江氏便继承了兰陵萧氏的“兰陵”郡望。《新安名族志》所称“郡号兰陵”即以郡望称之,这可以以《新安名族志》称济阳江氏“郡号济阳”为证。后修于天启年间的《休宁名族志》,在论述萧江氏时称:

又有萧江氏,本萧姓。唐宰相遘之仲子曰祜,为护军兵马使。广明间征逆巢有功,封柱国上将军,镇守江南,驻兵于歙之黄墩,谋复唐业不克,遂指江为誓,异姓江焉,故郡望兰陵^[3]。

《休宁名族志》记载与《新安名族志》大体无异,只在段末改为“故郡望兰陵”五字,则又可证“郡号兰陵”即“郡望兰陵”无疑,而并无所谓更歙州名为“兰陵”之意。

另外,从史实方面考察,唐末萧祜将歙州以及毗连的宣州等地更名“兰陵”之说也是不能成立的。

潘志义根据萧江氏族谱中关于“迁徽易姓”的记载,认定在唐末五代,“时任江南节度使”的萧祜“谋复唐业不克,退而占据皖南山区的宣、池、歙诸州,也不做什么‘江南节度使’了,把他统治的皖南山区称为‘兰陵’郡。”^[4]

首先,潘志义所引用萧江氏族谱中萧祜“江南节度使”的官职,完全是萧江氏后人凭空杜撰的。唐末歙州属宣歙观察使,大顺元年(890年)三月,唐昭宗“赐宣歙军号宁国”^[5],改属宁国军节度使,终唐一代,并无所谓“江南节度使”,后人伪造无疑。另外,史载景福二年(893年)^[6],杨行密兵略歙州。八月,“(杨)行密即以(陶)雅为歙州刺史,歙人纳之。”^[5]歙州从而并入杨行密的势力范围,此后又为南方杨吴、南唐政权相继控制,直至宋灭南唐才重新纳入中原政权版图。杨行密占领歙州后,任命部将陶雅为歙州刺史管理歙州,又据《九国志》记载,天祐十年(913年)陶雅卒于“知歙州团练观察”^[6]任上,可知陶雅在唐亡后继续镇守歙州,任职歙州前后达20年之久,故罗愿《新安志》称“雅在郡凡二十年”^[7]。所以萧祜在唐末任“江南节度使”,“驻兵黄墩,北攻朱温”之事也不可信,萧祜不可能越过陶雅,甚至越过杨行密来北攻朱温。最后,据《萧江全谱》所载世系,萧祜卒于唐昭宗景福二年(893年),距唐哀帝天祐四年(907年)朱温篡唐尚有14年的时间,与天祐元年(904年)李克用、李茂贞等人以兴复唐室为名讨伐朱温,也有11年之差。因而所谓“朱温篡唐,萧祜统领江南之兵北上与李氏宗室合谋兴唐大业,终不能克,退而占据江南”^[8]之事,也只能是萧江氏后人为美化先人而编造出来的。萧祜其人不见于史书,方志所载又系后出^[9],其身份甚为可疑。萧江氏族谱中关于始祖萧祜“迁徽易姓”的诸多记载,也多与史实不符,很难作为研究唐末五代歙州历史的依据。

综上,从文献与史实两方面,我们可以认定徽州在唐末五代时期曾经改名过“兰陵”这种说法是站不住脚的。所以,以此来说明“兰陵笑笑生”是徽州人(甚至明确为汪道昆)的说法,自然而然也是难以令人信服的。

三、《水浒传》与汪道昆的关系不宜夸大

《金瓶梅》故事脱胎于《水浒传》之中,因而在情节安排、人物设计、语言运用等方面深受《水浒传》的影响。在目前已知的诸多版本的《水浒传》中,“天都外臣序”本是其中重要的一个版本。关于天都外臣其人,沈德符称:

今新安所刻《水浒传》善本,即其(郭勋)家所传,前有汪太函序,托名天都外臣者^[9]。

汪道昆号太函,可知天都外臣即汪道昆。但就目前所见材料而言,汪道昆与《水浒传》的关系仅仅是序作者的关系。但潘志义等人提到汪道昆与《水浒传》的关系时,却多次指出汪道昆曾参与到了《水浒传》文本的编定之中,仅举几例:

例 1. 汪道昆在万历十五年(1587)左右,完成了《水浒传》编撰工作,于万历 17 年(1589)付梓^[10]。

例 2. 汪道昆在万历 17 年前,研究《水浒传》的章回结构,校编好百回本《水浒传》后,即着手创作《金瓶梅》无疑^[11]。

例 3. 众所周知,《金瓶梅》斯书是从徽州人明代兵部左侍郎汪道昆编纂的百回繁本《水浒传》中第 23 回至 26 回抄出,演义成 100 回近百万字的世界名著^[12]。

例 4. 笔者经过研究,认为这种现象并不是抄袭,而是因为明朝万历年间《水浒传》的整理、刊刻者“天都外臣”——徽州人汪道昆,与稍后面世的小说《金瓶梅》的作者“兰陵笑笑生”可能是同一个人^[13]。

潘志义等人在文章中不仅多次强调汪道昆参与编定《水浒传》,更有甚者,竟然篡改引文,以合己说。吴晗的《〈金瓶梅〉的著作时代及其背景》一文,为考证《金瓶梅》著作时代的名作,文章称:

“嘉靖中大名士”是一句空洞的话,假使可以把它迁就为王世贞,那么,又为什么不能把它归到曾著有杂剧四种的天都外臣汪道昆?为什么不是以杂剧和文采著名的屠赤水、王白谷或张凤翼?那时的名士很多,又为什么不是所谓的前五子、后五子、续五子以及其他的山人墨客?我们有什么反证说他们不是“嘉靖间的大名士”^[14]?

吴晗以此来说明,仅以“嘉靖间大名士”来确定王世贞就是《金瓶梅》作者的论据不充分。而潘志义引用吴晗文章时,却篡改吴晗原文为:

假使我们可以把它迁就为王世贞,那么,我们又为什么不能把他归到曾著有杂剧几种和托名天都外臣编有《水浒传》的汪道昆^[11]。

引文与原文多处不合,尤其“托名天都外臣编有《水浒传》”一语更具蒙骗性,若不仔细核对原文,很容易让人误以为“汪道昆参与编定《水浒传》”是吴晗的观点,而潘志义篡改过的引文后又被王潮涌转抄入其《汪道昆创作〈金瓶梅〉考》^[15]一文中。

这些持《金瓶梅》作者汪道昆说观点的学者们,如此强调汪道昆参与编定《水浒传》,无非是希望通过在汪道昆与《水浒传》、《水浒传》与《金瓶梅》之间架起某种联系,增加某种可能,但是我们目前的材料并不能证明汪道昆参加过《水浒传》的编定工作。在《水浒传序》中,汪道昆称其所序本《水浒传》为一“好事者”编定,并无自指之意。而且即便汪道昆曾经参与编定《水浒传》,也并不能证明汪道昆就是《金瓶梅》的作者,毕竟《水浒传》一书成书过程十分复杂,“水浒”故事又深入民间,文人墨

客熟悉“水浒”故事的人又极多,仅仅因为汪道昆曾为《水浒传》作序,并不能证明其与《金瓶梅》的创作有何必然关系。所以持《金瓶梅》作者“汪道昆说”的学者根本没必要如此无中生有地强调汪道昆曾经参与编定《水浒传》,更不必用更改引文的方式来证明。

四、《金瓶梅》为“徽州方言”论据不充分

关于《金瓶梅》中方言问题,相关的研究有很多,“山东方言说”、“吴方言说”、“上海方言说”、“北京方言说”等等不下十几种,各种说法分歧相当严重。为证明《金瓶梅》一书出自徽州,持《金瓶梅》作者“汪道昆说”的学者们试图从书中所存在的“徽州方言”角度来论证。但实际上,这些论证本身存在着很多的问题,并没有很强的说服力来证明《金瓶梅》一书出自徽州。

首先,《金瓶梅》一书脱胎于《水浒传》,因而其在语言等方面深受《水浒传》的影响。如“害病”一词,《金瓶梅》第五十二回:

原来你院中人家,一日害两样病,做三个生日^[16]。

潘志义称:“徽州曰生病为‘害病’。”^[17]实际上,“害病”作生病之意在《水浒传》中已经能够看到,如:

高太尉骂道:“贼配军!你既害病,如何来得?”^[18](第二回)

众人寻思不下,数内有一个道:“既是敢来劈牌,要做天下对手,不是小可的人,怕人算他,以定是假装害病的。”^[18](第七十四回)

可见“害病”一词不独徽州所有,而应是《金瓶梅》受《水浒传》影响的体现。

再如“肉奶奶”一词,见于《金瓶梅》第二回,以此描写描述潘金莲体态。潘志义认为同样为“徽州歙县方言”,“身体丰满,身体肥壮之谓也。”^[19]其实“肉奶奶”一词同样源自《水浒传》中。《水浒传》第四十四回,作者借石秀之眼,描写潘巧云的体貌,以暗示潘巧云的色与荡,书中称:

黑鬢鬢儿,细弯弯眉儿,光溜溜眼儿,香喷喷口儿,直隆隆鼻儿,红乳乳腮儿,粉莹莹脸儿,轻袅袅身儿,玉纤纤手儿,一捻捻腰儿,软脓脓肚儿,翘尖尖脚儿,花簇簇鞋儿,肉奶奶胸儿,白生生腿儿。更有一件窄湫湫、紧皱皱、红鲜鲜、黑稠稠,正不知是甚么东西^[18]^[594]。

这一描写被《金瓶梅》作者全部移植到了书中,只是描写的对象改为了潘金莲而已。因此“肉奶奶”一词,也不能认定就是徽州方言。

除了受到《水浒传》的影响之外,《金瓶梅》书中的语言还受当时其他小说戏曲以及当时语言习惯的影响。如“伴当”一词,其义“专指地主家内奴仆”,在歙县等地又指“役使如奴的佃户”^[20]。潘志义根据雍正帝开豁诏书中有“近闻江南徽州有伴当”一语,认定“‘伴当’这个称呼只限于徽州一地使用。”^[19]但细检他书,明清小说中多见“伴当”一词的出现,如:

二魔道:“叫那常随的伴当巴山虎、倚海龙来。”^[21](《西游记》第三十四回)

木耐大喜,情愿认作萧云仙的亲随伴当^[22]。(《儒林外史》第三十九回)

可见,“伴当”这一称呼并非仅限于徽州一地,并不能认其为徽州方言,也就不能作为证明《金瓶梅》作者为徽州人的证据。

关于《金瓶梅》的方言研究,有学者认为“实际上,对某一方言的确定必须具有排他性,确定《金瓶梅》的方言当然也是如此。就是说,你除了要证明《金瓶梅》中的语言与某方言相符,还必须证明它与其他方言都不符。”^[23]而潘志义对《金瓶梅》中语言就是徽州方言的论断明显还做不到这一点,除上述几例外,潘志义所认为的许多徽州方言词汇,如“胡”、“嘲”、“这咱”等词,在其他许多方言中同样存在,也足见《金瓶梅》语言为徽州方言的论据不充分。而且“在一般词汇方面,徽州方言大多是跟太湖片吴语相同”^[24],独立的“徽州方言”是否存在尚难论定,更不用说轻率地就认定《金瓶梅》中的语言为徽州方言了。

五、《金瓶梅》中“徽州习俗”论据不充分

潘志义认为金瓶梅中习俗多数为徽州所独有,似乎也不妥,篇幅所限,仅举“安席”一例证伪。

关于“安席”,《金瓶梅词典》称:“宴会入座时敬酒、行礼,谓之安席。”^[25]潘志义在文章中则不止一次地提到徽州的“安席”习俗,称“安席”为“徽州方言口语,徽州风俗的常用口头语”,具体为“徽州请客摆酒,按来辈分大小,职务高低,年龄长幼安排位次之谓也。”^[19]并讥讽由“诸多学者参与编写的《金瓶梅词典》既错又误,可见时下学风不正,浮躁透顶。”^[26]

但是笔者搜集明清戏曲小说资料,发现“安席”习俗广泛存在于明清小说之中,并非徽州所独有。如:

赵云曰:“某愿往擒此二人!”言讫,上马引军出。玄德在城上管待马超吃酒。未曾安席,子龙已斩二人之头,献于筵前^[27]。(《三国演义》第六十五回)

那女王敛袍袖,十指尖尖,捧着玉杯,便来安席。行者近前道:“我师徒都是吃素。先请师父坐了左手素席,转下三席,分左右,我兄弟们好坐。”太师喜道:“正是,正是。师徒即父子也,不可并肩。”众女官连忙调了席面。女王一一传杯,安了他弟兄三位。行者又与唐僧丢个眼色,教师父回礼。三藏下来,却也擎玉杯,与女王安席^[21]。(《西游记》第五十四回)

安席的习俗复杂繁琐,除按爵秩、年齿叙座之外,还要一一把盏敬酒,所以《红楼梦》中贾宝玉感慨到:

这一安,就安到五更天了。知道我最怕这些俗套子,在外人跟前不得已的,这会子还恼我就不好了^[28]。

另外,从上引《西游记》对女儿国国王与唐僧师徒安席时的描述可知,宴会中的安席“包括叙座、把盏两项内容”^[29],而潘志义与《金瓶梅词典》各述其一,都没有完整展现安席习俗的全貌。

以上的论证重点不在于揭示“安席”的实际内容和含义,而在于说明安席习俗在明清两代广泛存在,便不能因为徽州至今仍有流传,就认为徽州所独有。除“安席”外,潘志义所述许多“徽州习俗”也都有同样的问题。另外,张健先生也认为,徽州是一个移民社会,方言与风俗多随移民而被带入徽州,“所以《金瓶梅》中的方言和风俗与徽州方言和风俗有部分相同,不能佐证汪道昆就是《金瓶梅》的作者。”^[30]张先生从移民社会的角度来思考徽州方言、风俗与《金瓶梅》的关系,颇有见地。

六、结语

近年来的《金瓶梅》作者研究,虽然表面上十分繁荣,但真正的有价值的成果并不多。在没有直接相关的新材料发现之前,《金瓶梅》作者的研究很难有进一步的突破,虽然这并不意味着要放弃相关的研究,但是在对《金瓶梅》作者提出假说的时候,要有足够的证据支撑。而且在研究方法上,不能在研究之前就预设了一个结果,然后再围绕这个预设的“结果”找证据,这是一种本末倒置的方法。最重要的是,关于《金瓶梅》作者的讨论属于学术研究的范畴,不宜将其卷入某些利益之争中,在进行相关研究

时,“我们应该防止狭隘的地方主义情绪,因为它会把人的聪明才智都蒙蔽住的。”^[31]

参考文献:

- [1]潘志义.《金瓶梅》与徽文化研究概论[C]//黄霖,杜明德.《金瓶梅》与临清——第六届国际《金瓶梅》学术讨论会论文集.济南:齐鲁书社,2008:546.
- [2]戴廷明,程尚宽.新安名族志[M].合肥:黄山书社,2004:520.
- [3]曹嗣轩.休宁名族志[M].合肥:黄山书社,2007:598.
- [4]苟洞.兰陵笑笑生考[J].徽州社会科学,2007(8):18-26.
- [5]司马光.资治通鉴[M].北京:中华书局,1956.
- [6]路振.九国史[G]//二十五别史.济南:齐鲁书社,2000,4.
- [7]罗愿.新安志[G]//宋元方志丛刊:第8册.北京:中华书局,1990:7746.
- [8]苟洞.兰陵笑笑生考[J].徽州社会科学,2007(8):18-26.
- [9]沈德符.万历野获编[M].北京:中华书局,1959:139.
- [10]苟洞.汪道昆避诏隐居黄山洪中留名迹[J].徽州社会科学,2007(12):32-33.
- [11]苟洞.《金瓶梅》成书时间考[J].徽州社会科学,2003(6):44-47.
- [12]苟洞.《金瓶梅》故事发生地是以徽州府府城为轴心的[J].徽州社会科学,2004(4)43-46.
- [13]丰吉.《金瓶梅》与《水浒传》“相互抄袭”?——《金瓶梅》作者“汪道昆说”的又一佐证[J].徽州社会科学,2007(11):30-36.
- [14]吴晗.读史劄记[M].北京: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,1956(18).
- [15]王潮涌.汪道昆创作《金瓶梅》考[J].徽州社会科学,2005(8):55-57.
- [16]兰陵笑笑生.金瓶梅词话[M].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1985:465.
- [17]潘志义.《金瓶梅》与徽州[J].徽州社会科学,1994(4):34-44.
- [18]施耐庵.水浒传[M].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1997.
- [19]苟洞.《金瓶梅》书中的徽州方言注释[J].徽州社会科学,2005(7):51-56.

-
- [20]叶显恩. 明清徽州农村社会与佃仆制[M]. 合肥:安徽人民出版社, 1983:233.
- [21]吴承恩. 西游记[M]. 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 1980:410.
- [22]吴敬梓. 儒林外史[M]. 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 1958:410.
- [23]孟昭连. 《金瓶梅》方言研究及其他[J]. 南开学报(哲学社会科学版), 2005(1):43-52.
- [24]周振鹤, 游汝杰. 方言与中国文化[M]. 上海:上海人民出版社, 2006:46.
- [25]王利器. 金瓶梅词典[M]. 长春:吉林文史出版社, 1988:149.
- [26]苟洞. 《金瓶梅》与徽州饮食文化考[J]. 徽州社会科学, 2010(5):44-51.
- [27]罗贯中. 三国演义[M]. 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 1973:564-565.
- [28]曹雪芹, 无名氏. 红楼梦[M]. 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 2008:866-867.
- [29]白维国. 金瓶梅风俗谭[M]. 北京:商务印书馆, 2015:334.
- [30]张健. 徽州鸿儒汪道昆研究[M]. 芜湖: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, 2014:78.
- [31]张惠英. 《金瓶梅》研究的中美交流——谈谈我和“金学”研究[C]//刘海平. 中美文化的互动与关联——中国哈佛-燕京学者第一届学术讨论会论文选编. 上海: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, 1997:3.

注释:

1(明)江旭奇等:《萧江全谱》卷1《世系》,万历三十九年刻本,上海图书馆藏。

2 民国二十五年许承尧等人编《歙县志》始有《萧祯传》,疑为志书编纂者据后世萧江氏谱牒增入,又系后出,不足为信。